

科普吧

亲历扶乩

□何宏

扶乩是至今偶有所闻的一项传统迷信项目,其基本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比如烧香念咒,请“鬼神”降临,然后由人扶持器械,比如插着笔的簸箕,在桌面或沙盘上画出与人对话的文字。

有时,词句的意义一目了然,有时则需要专人解读。何以“鬼神”要通过这种方式“显灵”,相信者从未追问一个究竟。在怀疑者眼里,由于有人直接参与,必定是作假,其虚妄性不言而喻。

据考证,扶乩可以追溯到宋代,不少文人墨客记载了当年民间盛行请“紫(子)姑”的游戏。解放后,由于被划为封建迷信,此类现象一度销声匿迹。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扶乩在有些地方又有抬头,而且“请”到的竟是逝世不久的建国领袖。类似现象国外也有,自19世纪中期“唯灵论”泛起之后,为了沟通“鬼魂”,有些“灵媒”采用“自动书写”与扶推“奥吉板”(其上有26个字母可以拼写词句)、“转达”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思想。可见,扶乩是有相当生命力的社会文化现象。

1996年4月,我到上海出差,在近郊某农家身临其境地考察了一个案例,同行者有我的同事陈朴与复旦大学的孙时进博士。事情的起因是有一位大学生郑某与孙时进教授联系,称村里有人搞这种活动,近半年他母亲也卷了进去。他本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认为很神奇,希望请到行家作鉴别。孙是心理学博士,博士论文是研究催眠术,对可能涉及下意识与潜意识的种种神秘现象一向饶有兴趣。我们与小郑约好时间,乘公共汽车去了他家。极具讽刺性的是,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我们却要去“看鬼”的表演。

小郑的家境似乎不错(据本人说在当地属于中等),他母亲一望而知是一位纯朴农妇,六十岁出头,据说并不识字。

下午四点钟,他们请来另一位扶乩者,瘦高个,三十余岁的李姓女子,听说小学文化。值得一提的是,自进门到整个扶乩结束,她一直表现得非常平淡,没有喜怒于色的表情。

扶乩第一步,是降“神”,或者说请“鬼”进门。这个仪式四点半左右开始。

小郑母亲与李嫂蹲在空旷房间的墙角点起两根红蜡烛,烧了十几只草纸折的“元宝”,然后把托着蜡烛的木台摆到位于房子正中的一张红木方桌上。一张大白纸铺满了差不多整个桌面。她们再用一只细箩,盛着面粉均匀地筛在纸面上。然后,托出一只蒙着一块绿布的簸箕,箕面朝下,箕头插着一只四五公分长的铁钉。两人相对,靠着桌子两边,一人出右手,一人左手,用食指、中指和大拇指托起簸箕,钉头距离桌面不到一寸的高度。在整个过程中,两人都没有说话,显然是经常做,配合得已经很有默契。

没过多久,就看到箕头下沉,铁钉做笔,缓缓地在面粉上竖向写出三个字:“徐世英”,据说这是招来的“冥灵”的名字。扶乩者已经挺熟悉这个角色,她们介绍这一位是住在好几里外徐家屯的妇女,1987年去世,时年34岁。“鬼”上门了,不过满屋子的人并没有害怕的感觉,只是气氛变得肃穆并开始有点神秘。

“大家可以问问题了!”

同事陈朴首先提问:“你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鬼”回答很快有了,钉头在纸上写出“北京”。

小郑问:“我嫂子姓什么?”也对了。

陈朴接着问:“拿摄像机的叫什么名字?”

“鬼”没有动作,四周熟悉者帮着说:“知道你点头三下,不知道你就画个圈。”钉头慢慢画了个小圈。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里,我们自然地询问了许多问题,并开始逐步逼近真相:扶乩者李嫂所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来访者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几口人,甚至他人都能看到图文并茂,“莫仙”都不知道;甚至连她亲手抽取的扑克牌,只要避开了她的双眼,“莫仙”也知其花色点数;我们提议是否可以另外上个人换她下来,“莫仙”画圈拒绝。

情况非常明了,李嫂才是关键人物,是在用自己的手指操纵簸箕的运动,只因为手部动作作小,缺少疑心的普通人往往看不出来。这里没有“鬼神”的影子,也没有丝毫的“特异功能”。

由于在民众中普遍缺少理性的、怀疑的、批判的态度,缺少对迷信文化的基本了解,他们往往被一些并不高明的表演所征服,前些年的气功、特异功能狂热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非常薄弱。

另外,好些问题并非一定就像初看上去那么简单:比如我们能够简单地认定李嫂故意骗人吗?这么做对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连心理学教授孙时进博士也觉得不易回答。要想判断她是否恶意,是不是心理紊乱或多重人格,需要很细致的专门测试分析。

如果只是因为自己厌恶,便过于简单地用“不是……就是……”,“既然……必定……”的逻辑轻率下结论,我们便可能违背了自己提倡的严谨求实的原则,结果常常反而为被批判对象赢得了同情者。宣传科学固然重要,但科学承认自身是有限的,不足以解答所有问题。所以,有理有据、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教会人们学会仔细观察、严密思考、学会逻辑分析,这才是防止轻信、避免自欺与被骗的可靠法宝。

(<http://blog.sciencenet.cn/u/Helmholtz>)

由于在民众中普遍缺少理性的、怀疑的、批判的态度,缺少对迷信文化的基本了解,他们往往被一些诸如扶乩之类的并不高明的表演所征服。



视点

两类不同性质的考试

□冯大诚

“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考、考老师的法宝儿”,我第一次听说的这句话,是近半个世纪前,在大学同学王X同学的口中,她是遇到的第一个北京女生。我第一次听到“命根儿、法宝儿”那样的儿化音,感觉特别新鲜,印象特别深刻。也是从北方同学那里得知,他们在中学时成绩就是要排名的。

老实说,对于考试和分数,我从小到中学,基本上没有怎么在乎,学校也从来没有对于我们学生的成绩进行过排名。每次考试之前,我是基本不复习的,反正弄个5-或4+(百分制的八九十分)我就满意了。那时,老师也并不逼我们学习,我与老师未处于对立的状况,所以也不觉得考试是老师的法宝。

大学毕业之后,我做了4年中学教师,研究生毕业后,又做了30年的大学教师。做教师总要考试和判卷,我很幸运,教中学时我那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三门功课我一个人说了算。在我所在的大学,一般还是干涉教师的教学权力的,我愿意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我出题,我判卷,学校只要一个分数。对于考试,我一般不去一道题一道题斤斤计较地算分,一张卷子看个大概,就能得到他学习状况的总的判断,给个总分就完。一道题一道题的加分,看似公平,其实并不能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我也不像大多数人那样,考试完毕不让学生把试题带走,而是要求把试题带走。用过的试题有什么保密的?学生拿走试题,总是会去研究错和对,怎样做才对。对于历年的试题,随时可以到我这里去拿,自己去复印。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是每年出题都要绞尽脑汁。

我们现在经常批评应试教育,其实,要知道一个人的水平,你不测试(或曰考试)怎么知道?

问题不在于是否考试,而在于怎样考试。现在中国的大多数考试,基本上是一场糊涂。主持考试的大多是糊涂人,可以说是糊涂人考糊涂生。

我以为,所谓考试、测验、测试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教学一个组成部分,例如,中小学的期中、期末考试,平时小测验等等,姑且把它称为教学考试。教学考试的目的之一是让教师和学生自己明确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以后更好地教学和学习;这类考试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在复习和考试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学习到的知识。另一类是选拔性质的考试,例如,高考、考研、公务员考试等等,我把它称为选拔考试,其唯一的目的是选拔所需要的人才。这两类考试的性质不同,目的不同,考试的内容、方法也不应相同。

我在学校主持的考试,主要属于上述第一类考试即教学考试。考试的目的主要是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我教授的学科。考试的范围就是我教授的内容。一般地说,题目做对了就是学会了,但是做错了未必是没有学会。掌握了关键方法比会背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重要得多。现在的所谓“量化管理”只能适用于低级的被管理者和懒惰或糊涂的管理者。

对于第二类考试即选拔考试,无论在考试内容、考试方法以及判断考试结果等等各方面都与第一类考试不同。下面以高考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高考是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所以其考试范围应当是全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内容。毫无疑问,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有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在相当长的时期,不可能全部实现所有人的这个愿望。即使人人能上大学,大学也有好差之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所以,高考是整个中、初等教育的指挥棒,在相当长的时期,这是不可改变的现实。高考考什么,中、初等教育就学什

么,这个现实谁也改变不了。想依靠中、小学的自由,这只能是自欺欺人。现在我们的大学,理科的不懂地理历史,文科的不懂数理化,除了艺术生,大家都不懂音乐、美术,而艺术生除了他专攻的那一小点艺术,什么都不懂。其原因,就是因为高考不考,学校不教,至少不认真教。因此,高考的内容、范围,应当是要求中小学学习的全部内容。

教育管理部门称,减少考试门数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那真是蠢人的自欺欺人。试想,如果考者一门,那考生仍然是一天到晚攻这一门,不考的那我就不教。如果不这样搞,家长首先不干,地方官也不干。(与这个问题相似的是考研,现在许多大学,特别是有的非重点大学,进大学就说一切为了考研,研究生考试需要的我就教,重点教,不考的就“自学”。结果这样的大学生考研的初试分数反而比重点大学学生高得多,而许多傻乎乎的学校却规定了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的比例,据说是“公平、公开、公正”,结果求取的就是那些德智体美和动手能力全面差劲的学生。)

有人问,为什么几十年前可以学理科的不考史地,文科的不考理化?因为那时高等教育规模小,中小学的学生能上大学的很少,中小学面向社会各方面,所以它必须全面地培养人才。今天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了,正如上面所说,大多数人都要上大学。因而高考对于中小学教育的影响,比几十年前要大多。你考什么,我就教什么,你不考的那我就不教。如果不这样搞,家长首先不干,地方官也不干。(与这个问题相似的是考研,现在许多大学,特别是有的非重点大学,进大学就说一切为了考研,研究生考试需要的我就教,重点教,不考的就“自学”。结果这样的大学生考研的初试分数反而比重点大学学生高得多,而许多傻乎乎的学校却规定了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的比例,据说是“公平、公开、公正”,结果求取的就是那些德智体美和动手能力全面差劲的学生。)

总之,高考的范围应当是中小学生学习过的全部内容。考研的范围应当是大学以及以前所学的全部内容。

(<http://blog.sciencenet.cn/ufdc1947>)

书生e见

□蓝劲松

在中国,当大学老师的,最高层次的荣誉是做到院士。但文科院士评选已经基本消失,所以搞文科的想成为院士基本无望(个别学科如管理学例外)。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博导成为最高荣誉,也因此不少人心中都有一个博导梦。我自己也不能免俗,但好在在下还不是博导,所以正好有资格“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说点酸葡萄的味道——不当博导的好处。

1.不当博导可以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越是应用学科,越需要也越可以让博士生帮自己做实验,搞调查;越是基础学科,越需要自己苦心钻研,免人打扰,又自由交流。大思想家基本靠自己直面世界,批判审视前人成就,再以独创性的理论凸显空谷足音。没听说搞基础理论研究的爱因斯坦培养了多少博士生。马克思不是博导,尼采

不是,萨特也不是。他们很多甚至就不在大学呆着——呆在大学任教的多是学者,而不是思想家。思想家最需要的是自由。杜威倒是培养了多位中国博士,但杜威这些优秀生给中国人带来的多属启蒙式的思想传导,独创性的思想并不多。他们有成绩(高分读名校)而无成就(学术一思想成就不大)。工科博导或许可以成为“老板”,但其应用学科性质决定了工科博导的研究大多不会是原创性的重大突破。人文博导也可以做表面风光,实际空虚的老板,但其真正成就不可能靠学生完成。试想,自己都靠不上,还想指望学生帮自己,那不是白日做梦(一旦学生完成有影响力的论著,那也基本不属导师的成就,而是学生本人的贡献)。所以不当博导就是给自己断后路,逼自己成才成家。

2.不当博导就不必给学生经费。带博士生要交给学校少量经费,这且不说。当上博导,多

少要给学生派活,给经费。而不当博导,没有博士生自然就不必申请课题弄经费。理工科多数学科没有经费就没法运转,没有经费就没有学生报考——也就是导师无能。这人文基础学科完全不同。没有课题没有经费照样干活。有了课题没有经费更可能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试问有几个人人文社科名著是通过搞课题搞出来的?又有哪部经典是靠钱堆出来的?《资本论》不是!《辞海》也不是!当然《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也不会是。“课题申请像疯子,课题到手像傻子,课题结题像骗子。”理工各科完成课题不敢妄加评价,人文基础学科课题则敷衍近之。国家有钱不如改善一下中青年教师住房来得实在。以为用钱就可以“激励”出高水平有思想的论著,结果甚!

3.不当博导可以不招那些不合意的考生。当博导,既怕没人来报考,又怕招收的博士生不理

科研ing

今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一位年轻师兄,没有防备的状态下,在野外被毒蛇咬伤。处理的过程,像小说中那样富有戏剧性。

夏天的故事

□孟津

这几年每年做完野外,都要写点夏天的故事。今年动手晚了,因为要做的事情多一点。年初去南极记了5万字的日记,到现在也没有时间去整理。别的东西就更不用提了。那个冷劲还没有过去,新一年夏天的野外工作又结束了许久。时间过得如此的快,把越来越多的东西都留在了后面。忽然之间就立秋了。这个时候,偶然听到降央卓玛的歌,西海情歌,走天涯,雨中飘荡的回忆,陪你一起看草原……一个1984年出生的女歌手,能有那样的天赋,好像有了很多的生活历练,能唱出那么悠远的歌声,给人一种奇妙,走到天边都能记起。

今年的夏天很特别,相当的长,好像过了18个月。哈哈,不知怎么就用了这么个数。反正挺长的,来回地跑,到后来有点累了。毕竟跑了那么多的地方,走了那么多的路,又是炎热的夏天,有时雨水把身上打湿,有时汗水把身上打湿,挺快乐的,而且令人难忘。但人不是永动机,总会有累的时候。戈壁滩上,好像我们有个约定,每年都能见着一面。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再也去不了那里。

今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一位年轻师兄,没有防备的状态下,在野外被毒蛇咬伤。处理的过程,像小说中那样富有戏剧性。他弯身去捡一块地的标本,被石头洞里的蛇蹿出来,咬在手指头上。被咬后,他以一贯的沉稳口气,在对讲机中说:我不幸被蛇咬了。大家都很紧张,赶紧把人从荒滩野外往医院送。但二连浩特医院没有治疗毒蛇咬伤的药剂和专家,只好往呼市或北京送。好在二连浩特现在有了机场,马上要起飞的飞机等了我们师兄几分钟,把他和另外一个护送同事拉到呼和浩特。本来想飞北京,但当天飞北京的飞机取消,只好住进呼市的医院。医生在被蛇咬的手上,咔嚓咔嚓拿刀切了几个口子,而且得保持刀口开放好几天,以便排出毒液,额的妈呀,那比被蛇咬还疼啊。这事把大家吓得够呛,我想他们家里人更是提心吊胆。后来听说那是蝮蛇的一种。好在戈壁滩上的蛇比较小,毒性也没有那么大,有惊无险,师兄安然无恙度过难关。回北京后,他给我看他的手,上面留下了几条刀痕,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啦。

那个蛇咬人的山头,被我们非正式地命名为蛇咬山。我后来又跑到那里去,把个小山头找了个遍,想见识一下是什么蛇如此大胆,咬我们的人。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估计它在哪个洞里闭门思过呢。在山头上找蛇时,为了弄清楚蛇攻击人的位置,我给那位师兄打手机搞调研,结果他关机。后来我们另外一位同事接到师兄电话,让他告诉我,不要再去打扰那条蛇。本来是他先去打扰人家的。他可能以为我要去替他报仇,踢那蛇一脚什么的。其实不是的,我就是想看一下那蛇长什么样。我们在这个地区做了几十年的野外,这是第一回出这样的事。见它,也是一种缘分。可惜我和它无缘。

又是一个夏天,多少讲不完的故事,明白的人自然会明白,也会记得一辈子。

(<http://blog.sciencenet.cn/u/jinsblog>)

不当博导的好处

想。遗憾的是,这年头相当一批学生读博不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和能力,而是出于就业的考虑。本来这无可厚非。问题是博士生做论文多不容易,导师也难以帮大忙。一旦学生论文做得乱七八糟,难免令人不快。再说了,这就业也是个麻烦事。招了学生进来,若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这时学生的责任是主要的,但导师脸上似乎也不是很光彩。

4.不当博导能聚焦于自己的目标。作为人文学者,人生一书足矣!不必指导学生,不必勉强自己弄经费,结果就是自己多出时间,也就是多出自由。有自由就可以慢慢地打理自己心中的神山,构造自己的金字塔。若老来回头一望,发现自己做课题太多,弄钱太多,教学生太多,出书太多,写论文太多,真正的成就却没有。那得乎?失乎?很恐怖的!

(<http://blog.sciencenet.cn/u/lanjs>)